

〈論文〉

古代日本留学者

——围绕胜鸟养——

古代日本の留学者たち

——勝鳥養をめぐる——

泉 敬 史

前 言

仅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古代日本最初的留学者是女性，其名为嶋。嶋是从中国大陆来日本的鞍作村主司马达等之女，她在推动佛教受容的大臣苏我马子的部署下，成为日本最早的出家人，此后前往百济留学，学习受戒法。嶋似乎有同行者，但人数和名字未被记载。与她同时期出家的二位弟子，汉人夜菩之女丰女和锦织壶之女石女可能是其同行者^①。嶋出家后称善信尼，留学三年，于崇峻三年（590）三月归国，住在樱井寺^②。

继嶋之后的留学者出现在十八年后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的记载中。“唐客裴世清”归国之际，推古天皇再次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大使，再度出使隋朝。此次遣隋使一行中有四位学生和四位学问僧，他们是史籍所记载的最早从日本去中国的留学生。此八人中有后来实行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老师南渊请安^③，在大化五年的八省百官设置中功不可没的高向玄理和僧旻^④。

上述留学者出国记录和归国后事迹史籍上均有记载。此外还有些留学者作为归国者突然出现在历史上，此后便再无记载，或者在中国文献中以中国名的日本人身份出现，但至今无法确定其相应的日本名。关于日本古代留学者，本人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勉诚出版刊的《亚洲游学》杂志上^⑤，该文分析了《日本书纪》及《续日本纪》记载中对留学者称谓，比如以僧籍和俗籍区分留学者“留学僧”“留学生”，“学问”意味着“留学”时期的“学问僧”“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请益”和“游学”等称谓，揭示了日本古代社会对周边诸国微妙的感觉变化。该文中还推断指出留学者名留史册所表现出的留学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变弱。随着文献考证的进展，众多留学者经历日渐明朗，但这只不过是缜密考证的成果，并不是因为正史中有他们出国和归国事迹的详细记载。留有其他值得记载事迹

的人物，与著名人物有血缘关系的人物可以名留史册，其他人大多以一句“○○等”就被概括在内了。但是另一方面，只有一处记载的人名没有大使，副使，通事，留学者头衔，这是为何呢？当然我们不能说《日本书纪》和《续日本纪》的记载都是在完美的，但在日本国费派遣众多留学生摄取中国文化的最盛期遣唐使时代，我们着眼于这样的事例进行考察还是饶有趣味的。

一、高表仁的同伴者

《日本书纪》舒明天皇四年（632）条中有如下记载：

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於对馬。是時学問僧靈雲。僧旻。及勝鳥養。新羅送使等從之。

此记载中出现的五人中，高表仁是唐的使者，三田耜是前年舒明天皇二年（630）八月作为第一次遣唐使节入唐的犬上三田耜。僧旻如前所述是随608年派遣的遣隋使入隋留学的新汉人日文。僧侣灵云作为“沙门灵云”见于《元亨释书》，《善邻国宝记》等史籍中，在《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元年（645）条中位于十大高僧之列，在此其明确的头衔是学问僧。最后所剩一人为胜鸟养，《日本书纪》和《续日本纪》此后再无关于他的记载，其他文献中亦无提及。此外，他无任何头衔，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为何会被《书纪》所记载呢？不由人不产生兴趣。

首先，整理一下可以考虑到的可能性。鸟养与灵云，日文两位留学者并列记载，所以也有可能是留学者。从他的名字来看，不是僧籍，是俗籍的留学生。被称为“学生”的俗籍留学生的最早记录是608年的遣使记载，但该记载罗列了八名留学者（僧籍四人，俗籍四人）的全部名字，其中并没有鸟养。而且该记载明确记载“并八人也”，而不是“○○等”，无法证明还有其他留学者。如果鸟养是留学者的话，那么关于他的出国日本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依据遣唐使时代留学者与使节同行的留学形式，鸟养究竟是与哪一位使节同行的呢？632年之前日本向中国王朝派遣的使节有630年派遣的第一次遣唐使，推古天皇二十二年（614）派遣的以犬上三田耜为使节的遣隋使。此前还有《隋书·炀帝纪》大业六年（610）条记载的“倭国遣使贡方物”，但此次派遣《书纪》中并无记载。再之前便是608年小野妹子的第二次遣使入隋，如前所述，本次遣使记载中没有鸟养之名。再前一年即607年是日本史料记载的第一次遣隋使，也就是小野妹子的第一次入隋。妹子的两次入隋都有通事鞍作福利随行，推古天皇十七年（609）妹子二次遣隋平安归国之际，史料留下了鞍作福利“不来”的记载，

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考察中应加以留意。

在以上五次的遣使中，都没有鸟养同行的依据。但是还有一次只有中国史料记载的日本遣隋使，即《隋书倭国传》记载的开皇二十年（推古天皇八年·600）的遣隋使。《隋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载了此次遣使，《日本书纪》中却只字未提。但《隋书倭国传》的记载中也没有鸟养的名字，所以断定他的渡海时间极为困难。

其次可以考虑的是鸟养可能不是从唐随行归国，而是同新罗送使一同加入高表仁一行。根据《新撰姓氏录抄》，“胜”姓是百济系的渡来人^⑥，由此可见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另外，根据八木充氏的研究，胜姓者渡来氏族从六世纪前半期开始被朝廷委以重任，主要掌管地方的秦部集团，统辖地方部民^⑦。在那个时代，渡来氏族作为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其存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作为与汉氏同为渡来氏族代表的秦氏的掌管者，胜姓者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胜姓者的直系鸟养很可能由于某种理由被派遣到朝鲜半岛。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其入唐的根据，更不能说明其名在正史中只出现一次的必然性。仅根据以上的考察，胜鸟养的真实身份还是不得而知。

二、倭人会承

关于胜鸟养，除了《书纪》中有他归国时间的明确记载外，其余均不明。但既然名留正史，应当认为他是朝廷正式派遣的使节的一员。参照此时期的《书纪》记载，名留史籍的派遣人员只限于大使，副使，通事以及留学者。另外，大使的名字无一例是省略的，副使也无一例往返均无记载。通事只有鞍作福利一人留名。鸟养的名字之所以能被记载，他是留学者的可能性很大。

关于鸟养的线索只能依赖于能否在这些遣使记载的周遍发现他的足迹。如上所述，《书纪》方面的记载全部落空。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史料。如果记载七世纪前期事件的中国史料中，有632年或前一年归国的日本留学者的记录，那么就有可能是鸟养。

有一部唐初编撰的佛教史料集叫《法苑珠林》。王勇教授在近著中提到该文献，涉及了该文献中出现的人物会承^⑧。

倭国在此洲外大海中，距会稽万余里。隋大业初，彼国官人会承来此学問，内外博知。至贞观五年，共本国道俗七人，方還倭国。

以上是关于会承的记载。倭国官人会承于隋朝大业之初来隋学习，内外知识渊博。贞观七年与本国僧籍，俗籍者七人一同返回倭国。大业年间从炀帝即位的605年开始，持续了12年。

大业之初有 607 年和 608 年小野妹子的两次遣使。另外，会承的归国是在贞观五年（631），他抵达日本的时间与《书纪》记载的归国时间一致。那么，这个会承是否就是胜鸟养呢？不能这样简单地加以联系，理由如下。

首先，史料记载会承与僧俗共七人一同归国。很容易令人想起 608 年遣使中“学生”和“学问僧”的人数为八人。但是如前所述，这八人的名字在《书纪》的遣使记载中均有明确记录，并没有鸟养之名。很有可能作为俗籍的“学生”被派遣的四人中有一人的中国名为“会承”。另外，正如王勇教授所提及，两次随小野妹子渡海的通事鞍作福利也有可能是会承。接上述记载之后，会承回答了日本的佛诸仪相，可能就是因为他是福利，而福利又是建造供奉于法兴寺的金铜释迦如来座像的鞍作止利的近亲，所以才有此发言。但是，对于这些反证，并不是毫无办法的。首先，八人一同回国，人数虽然一致，但成员未必完全一致。证据之一是：据《书纪》记载，“学生”之一的倭汉直福因并不是在 632 年归国，而是于九年前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与新罗大使一同入朝。另外，归国的记载中，608 年组只举了僧旻的名字也是片面的。再有，如前所述，《书纪》中还有关于福利未归国的记录。

那么，鸟养究竟何时渡海到中国的呢？如果他就是会承，那么如《法苑珠林》所载，他于大业之初被派遣入隋；并且是一位留学者，但是这种推论很难说明为何 608 年被派遣的人员中只有他的名字被割爱。也不能认为他是在没有留学生派遣记录的 607 年被派遣的。但是有旁证证明他的渡海未必就限定在大业之初。

《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所收的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有关于会承的记载，该记载与《法苑珠林》的内容大致重复，但也有若干差异。

倭国在此洲外大海中。距会稽万余里。有会承者。隋時来此学。諸子史統及術芸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京邑。貞觀五年方還倭国。

撰者道宣与著《法苑珠林》的道世同为居于长安的僧侣，是同时代人。关于会承，两者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的部分。考虑到两者的同时代性，应当十分重视两者的差异。撰写《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道宣，道宣死后翌年，会承归国三十七年后完成《法苑珠林》的道世，都相信自己之说而加以记载，其结果造成了差异。据道宣记载，会承的入隋是“隋时”而未限定为“大业初”。这样，会承也就有可能随日本正史中没有记载的 600 年遣隋使，《隋书》中仅有七字记载的 610 年遣隋使一同入隋。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书纪》中既然未记载该遣使事件，当然也不可能有留学者胜鸟养的出国记录了。归国记录中突然出现鸟养名字的理由可能就在于此，这个鸟养有可能就是名为会承的日本留学生。

注 释

- ① 《日本书纪》敏达天皇十三年条・崇峻天皇即位前记。
- ② 《日本书纪》崇峻天皇三年条。
- ③ 《日本书纪》皇极天皇三年条。
- ④ 《日本书纪》孝德天皇五年条。
- ⑤ 《亚洲游学 27》所收《关于遣唐使时代的留学称谓》。
- ⑥ 佐伯有清著《新撰姓氏录的研究考证篇五》。
- ⑦ 《律令国家成立过程的研究》。
- ⑧ 《中国史中的日本像》91页，《从唐看遣唐使》38页，《中国文献中的日本雕刻艺术》（《日中文化交流丛书7艺术》所收）181页。

本稿是2001年10月早稻田大学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古代日本・中国・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研究的新展开”国际研讨会中的发表论文。